行知公学的前前后后

邓凡平

（一）

一九四八年秋季一天中午时分，柳州私立文惠小学发生了一件引人注目的新闻：一队队衣着华丽、秩序井然的文惠小朋友放学离去不久，一群群衣裳褴褛、光着脚板的穷孩子，蹦蹦跳跳地涌进他们往日望门兴叹的学校大门，跨入教室，正襟危坐，面展笑颜，等待着老师和小先生来给他们上第一堂课。一间新型的学校诞生了。它的名称叫做“行知公学”。

这样一件现在看来平常之极的事情，当时何以引人注目，视为稀奇，究其原因，不外有如下几方面：

一是名称古怪。“行知”者，明眼人一看便晓，这是被国民党迫害致死的民主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大名。在陶先生尸骨未寒之时，打出他的旗号来，对当局未免不恭。“公学”者，就更为明显了，当时中国只有革命圣地延安有一间赫赫

有名专门培养红色干部的“陕北公学”，胆敢借用这个犯忌的名称，难道不怕有沾色之嫌？这是知识界中产生的疑虑。而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他们好奇的是：打民国以来，只见过小学、中学，从未听说过有什么“公学”、“母学”的。

二是待遇优异。众所周知，文惠小学是柳州一间收费昂贵的名牌私立学校。连公立小学也进不了的贫寒子弟，对它是从来不敢问津的。如今怎么突然出现这般离奇的事，它对两百多名行知公学学生。不仅分文不收，而且还赠送课本、文具、作业簿，甚至课外读物，真是令人费解。

三是师资过硬。在国统区，过去也有人搞过所谓义务教育，但都是牙牙乎；他们挂羊头卖狗肉，教师滥竽充数，教学极不认真。因此，群众望而生畏，文盲越扫越多。原因是，他们的脚跟没有站到劳动人民一边来。心不诚，则事不灵。文惠与之全然相反，他们怀着对劳苦大众的深厚感情，把办行知公学当成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从地下党员和进步教师中挑选出一批热情很高，经验丰富，工作认真的老师担任行知公学兼职教师。他（她）们的名字是：刘秀容、张光珍、李 铉 、戴端钧 、莫时灿等等 。依靠这支过得硬的师资队伍，打开了公学的局面。它的牵头人是地下党员、我的得力助手刘秀容同志。行知公学的日常工作由他主持，我则兼任校长 。我们 还特地在文惠高年级和文惠铁木耳儿童团骨干中，物色了一批品学兼优的学生担任小先生（现在柳州一中教师吴树奎便是当年文惠儿童团团长小先生的头头），做大先生的助手，从事教学辅助活动。这种小先生制，也是直接从陶行知先生那里学过来的，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他们不仅

负责发动文惠小朋友发扬互助友爱精神，捐赠课本、文具、作业簿，还负责维持秩序，组织课间活动，进行课外辅导，帮助批改作业，以及手把手地教小弟妹们描红习字。有的还登台讲课，登门补课。这些可爱的孩子们，他们与文惠老师们一道，为创办行知公学倾注了心血，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他们也在实践中增长了才干，提高了文化知识。

这是一间与众不同的新型学校。在浊流遍地的国统区，它的出现，象是从深山野岭中淌出了一泓沁人心脾的溪流，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这一新事物问世后，人们褒贬不一，毁誉参半。有人热情鼓励，赞扬它是教育界的创举；有人讽刺挖苦，责怪文惠“乱弹琴”；也有人不屑一顾，嗤之以鼻。

（二）

我们为什么想起办行知公学来的？说来话就长了。得先简单介绍一下行知公学的母体——文惠小学的有关情况。

文惠小学创办于1946年春，她从1947年11月起，就成了地下党和游击队的秘密联络站。学校的领导骨干和三分之一左右的老师，都是省立桂林师范学校（简称“桂师”）的学生。1948年夏，老校长邓锡藩老师病故，由我接任校长。从此，文惠小学的人事、教学、财务等大权，全部掌握在地下党员和进步教师手中。鲜明的政治态度和民主的办学思想，是这间小学的两个基本特征。正如唐诗上说的“应缘近水花先发”，行知公学诞生在文惠这块良田沃土之上，绝非偶然之事。

我（当时的进步教师，和杨才能同志先后入党），既是秘密

联络站的主要负责人，又是文惠小学的领导者 。 我们远在1941——1943年间，还在桂师当学生时，就曾亲身经受过陶先生的高足、晓庄师范出身的戴自庵老师的薰陶；从戴先生的讲课和日常言谈中，我们不仅知道了向往已久的晓庄师范的一些办学情况，而且对陶先生的教育主张、政治态度以及为人处世也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在我们年轻的心灵中，对陶先生的仰慕之情油然而生。我们曾暗暗立下志愿，待将来走向社会之后，要以陶先生为榜样，在教育事业上好好干一场，有所贡献。毕业之后，我们远道来柳，与邓锡藩老师一道，沤心沥血办文惠小学。“衣带渐宽终不悔”，这种对教育事业的虔诚态度、献身精神，无疑是受到陶行知先生的影响。无怪乎当时有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送我们一个雅号，叫“小陶行知”。诚然，今天来认识，这纯属溢美之辞，过份拔高了人物。但我当时年轻幼稚，又有点自负，竟沾沾自喜，引以为荣。由于我们对陶先生的由衷敬仰，当他被国民党迫害致死之后愤慨之情，郁郁在胸，历久不散。创办行知公学正好找到了一种表达情感的方式。说实在话，公学以行知命名，与其说是对陶先生的纪念，勿宁说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抗议。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我陆续从重庆《新华日报》和其他进步报刊上，看到有关延安杨家湾小学校长陶端予和淮北解放区小学教师夏陶然办学事迹的报道。这两陶办学经验，对正在进行探索、渴望在教育工作中闯出一条路子来的我，启发很大，鼓舞很大（至于这两人后来销声匿迹，又当别论），在我心灵中产生了强大的撞击，闪出了火花：一是坚定了我为

劳动人民办学的信念，二是增强我向传统教育挑战的勇气。文惠五年的办学实践证明，我们实行的这一套，与国民党教育部的要求是大相径庭的。难怪别人要骂我们“乱弹琴”了。两陶事迹的启示，是我们创办行知公学，并将它叫做“公学”的直接原因。

最后一个因素，是地下斗争的需要。文惠秘密联络站，担负着从各地撤退，转移来的同志的安排，接待和掩护工作；有的还长期在此治病养伤；一些地下党和游击队的负责同志，也常来这里指导工作。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我们决定花大气力来搞好与学校附近群众的关系，一旦发生变故，我们同志只要翻过一道矮墙，便可躲进群众家中，如鱼入水，如鸟投林，悠哉游哉，反动派其奈我何！如何搞好与群众的关系呢？我们对情况进行了分析：学校四周几条街，是有名的贫民窟，柳州的“龙须沟”，房屋简陋、火灾频繁、疾病流行，生活艰难。这就是对这儿的真实写照。绝大多数的居民靠打柴、卖水、搞搬运、拉泥砂、做小贩糊口。他们的子女，除少数几个有幸能入公立学校念书外，大多数失学，当光眼瞎子。他们或在家带弟妹，或跟父母打柴、卖水、推板车，或擦皮鞋摆香烟摊，有个别的则游游荡荡与小偷扒手为伍。我们认为，要搞好与群众的关系，光口惠而实不至是无济于事的，关键在于真心诚意地为他们办好事，使之得到实惠；而从我们这帮两袖清风的穷秀才的实际来说，除有点文化以外，此身别无长物。于是大伙一致认为，我们目前能为劳苦群众的好事，莫过于教他们的子女读书识字，创办行知公学的主意就是这么产生出来的。

但是，我们良好的愿望，群众对之却反应冷淡，为什么？原来这些穷孩子不能入学，有其实际困难，各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将家长们意见概括起来便是："读不起"和"没得闲"。实际是两个字：一曰穷，二曰忙。我们摸准情况之后，对症下药，采取了一切为群众着想的办学方针。具体措施是：针对他们家里"穷"，我们规定免收一切学杂费，还保证无偿供给课本、文具及作业簿，连他们胸前佩戴的"行知公学"襟章，也是文惠送的。一句话，读书不花钱。针对他们"忙"，我们还规定公学分中午、晚间两班，白天有事的晚间学，晚间忙的白天中午学，做到家务劳动与上学两不误，家长、学生双满意。我们还宣布，可以带弟妹来学校（小先生负责照顾），也可以背着弟妹听课。还规定，学生因事、因病误了课的，我们派小先生登门补课，等等。这一系列便民措施，铁石心肠也会感动。因此，受到群众热烈欢迎。他们感谢文惠老师们想得太周到了，表示自己再苦再累也要支持孩子上学。对孩子们来说：羁绊他们双脚的无形绳索剪去了，他们从家庭中解放出来了，一个个欢天喜地，奔走相告。招生布告张贴不几天，便有两百多人前来报名，盛况空前。

（三）

一些具体情况和潜在的不利因素。

一、人力问题。行知公学没有配专职人员，从校长到教师，全部由文惠老师兼职。这些同事都是文惠的业务骨干，多是秘密联络站的核心力量，本职工作够繁重的了，他们是在出色完成文惠任务之后，不顾身体疲劳、放弃休息的时间

来公学上课的。这种无私、忘我的奉献精神，至今思之，犹令人肃然起敬。但是，这种一身二任的情况，无疑也有不利的因素。人不是铁打的，一个人的精力终究有限度，超负荷运转，短期尚可，长期坚持确有困难。行知公学的持久性也就存在了问题。这在财力有限、人力紧张的文惠小学，是难于解决得了的。而当时我头脑比较热，对这个潜在的危险因素，缺乏认识。后来，眼看着体质较弱的同志累瘦了，病倒了，心里才着急起来。

二、名称问题。开始曾打算取名“武训小学”，主要是取武训热心为穷人家子弟办学堂这层意思，后来，经过反复掂量，觉得这个名称有问题：其一，小学里面套小学，两“小”容易混淆，何况我们原来打算不仅办小学，将来有条件还要办初中或职业学校，如果用小学命名，等于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捆绑起来了；其二，我们认为，纪念武训远不比纪念陶行知先生有价值。武如土丘，陶似高山。文惠这帮蔑视权贵、不肯为五斗米折腰的秀才们，对于武训向豪绅财主磕头下跪的一副奴才象，厌恶极了；陶先生不仅是全国闻名的大教育家，而且又是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伟大民主斗士，学校用他的名字命名，意义十分重大。于是，大家一致同意学校正式定名为“行知公学”，并慎重其事地给学生制作了白底金边红字的布质襟章，与正规学校无二。学校命名的变化，反映了我们思想认识是有个发展过程的。也就是从幼稚到成熟的提高过程。当然，用这四个颇为刺眼的字命名，可能会招来一点麻烦。对此，我是有了思想准备的，甚至连辩护之辞，也打好了腹稿。假如有人想在行知先生身上扯是非，我

则“王顾左右而言他”，回答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校，主张知而后行，我们将这两者关系颠倒过来，主张行而后知，别无他意。假如有人要以“公学”两字作文章，我则准备理直气壮地回答他：孙中山先生认为天下都可为公，学校怎么不可为公呢？公学者，众人之学堂也。文惠为街坊失学儿童办义务教育，顺乎情，合乎理，政府不奖励，不资助，于理不当，反来吹毛求疵，就更岂有此理了。我们想过，在民心和社会舆论方面，我们有得道多助的，站得住脚；更何况我们没有任何政治把柄落在他们手里，何惧之有？因此，我们正气凛然地办我们的行知公学，根本不去理睬他们，就连正常的申请备案手续也不办它。我们大笔一挥，招生布告一贴，就开学上课了，干脆利落之极，痛快之极！

三、教材问题。行知公学主要设算术和语文两门课程。虽然我们也采用国统区通用课本，但只选择其中有益内容。我们的原则是：算术除教授加减乘除基本知识外，以学习实用知识技能为主，使学生懂得打算盘，会记简单的帐，能折斤计两，等等。语文课则采取传授文化知识与灌输进步思想紧密结合的原则，以讲授自编语文教材为主。四八年暑期，南宁师范学院的张谷（原桂师同学）等人途经柳州，我请他们帮选编了一本语文补充教材，供中高年级使用，其内容选自“马凡陀山歌”、“李有才板话”等进步文艺书报。这份教材，思想进步，生动有趣，好懂易记。讲的人带劲，听的人高兴，课堂效果不错，有的学生还把课本当歌来唱。我们发现，这些内容通俗，针砭时弊的课文，他们兴趣挺浓，学

来津津有味，这与他们的家庭环境及个人较早地接触社会，不无直接关系。也就是说，生活使得他们的思想早熟了。当然，我们的语文课也存在不少缺点：重视思想教育，忽视文化教育；重视国内政治斗争的实际，忽视儿童学以致用的实际需求；此外，自编教材系统性不够，循序渐进差，等等。

四、经费问题。行知公学一应办公用费，均从文惠开支。锅里有，碗里自然也有。前面说过，小朋友们的学习用品，是由文惠铁木耳儿童团发动文惠学生捐赠的。由于刘秀容同志领导学生开展学习铁木耳活动搞得好，友爱互助蔚然成风，只需一声号召，不要几天功夫，三百多文惠小学生，便将行知公学两百多人的所需课本、文具、作业簿等，一一解决停当了。表面看来，经费不成其为问题。但是，正是在经费的来源这个问题上，文惠小学存在致命的弱点，隐藏着危机，威胁着它的生存。文惠小学与行知公学，是一分为二，合二为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文惠的致命弱点，自然也影响行知公学的前途和命运。文惠小学是一间经济基础十分脆弱的私立学校，唯一经费来源靠收学生的学费。老校长在世时，将学费托人做生意，可以增值，加上董事长尹承纲在柳州，遇上困难可以找他想法解决，学校日子过的还算平稳。我接长学校之后，实行经济民主，财务公开。管钱的人廉洁奉公，深得教师们的赞许。但是，一介书生，理财终非其长，又不会经商谋利，学校经费出现了困难，左支右绌，若一旦形势发生剧变，学生少了，收入减了，董事长走了，学校就将陷入困境。那时候，支撑一个文惠就够吃力的了，哪能还有余力来顾及行知公学的呢？这个潜在危险因素，随

着形势的迅速发展，对文惠生存造成的威胁越来越严重，这是我始料不及的。

（四）

行知公学坚持了整整一个学期。进入一九四九年，全国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继1948年辽沈战役之后，淮海、平津两大战役，先后于1949年1月胜利结束。我百万人民解放大军，正准备南渡长江。蒋家王朝风雨飘摇，危在旦夕。国统区内通货膨胀、民不聊生。柳州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又系桂系后方重镇，估计会有场恶战。富商大贾，远走高飞，殷实之家，迁回农村，市面萧条，人心浮动。各校学生锐减，文惠尤为显著，这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为了保全文惠这一红色据点，我们采取了紧缩开支、精简人员、降低薪俸等应变措施；在此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忍痛割爱，宣告行知公学暂时停办，候机再行复课。

我们当时的想法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文惠不关门，行知公学就有恢复之日。我们认为，天快亮了，黎明之前的黑暗是不会长久的。一位诗人说的好，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寒夜，文惠老师们心头暖和和的，他们满怀兴奋之情，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向往着解放之后，在那“春风桃李花开之日，正是英雄用武时”的新社会里，大显身手，重振雄风，完成陶行知先生的未遂之志。

行知公学停办了，它犹如黑夜中一只小小的萤火虫，在拼命闪烁了一阵微光之后，自身便无形无踪地消失。但是，

柳州私立克强小学沿革

陈显达

柳州私立克强小学，初名楚材小学，取“唯楚有才”之意，为湖广会馆所创办。

湖广，为我国历史上行政地区：元置湖广行省；明置湖广布政使司；清置湖南、湖北两省。会馆，为地区、省、县同乡人旅居外地联谊组织聚会之馆所。

克强小学1929年开办，校舍仅用湖广会馆之一部份。开办时有四班学生，校长李泮源、教师赵国英（女）、周天枢均湖南籍。采复式教法：两班（不同年级）同一教室上课，一班作业，一班讲课。经费由会馆所有房地产租金供应。据1950年统计会馆所有房地产110余间：西门外马草坪至雅儒桥头有简陋厂房90余间；分部在柳江路、小南路、映山街等楼房铺户20余间。这些房地产来源，系旅柳经营手工业、商业的湖广老乡回籍时所捐赠；也有客死柳州，后事无人处理，由会馆办理丧葬后所留下的遗产。

旧社会以每年农历5月13日为单刀会，纪念三国时的关羽

（紧接上页）它那闪烁的微光，却映入了人们的眼帘，嵌入了人们的心头。在人们的记忆长河里，这微弱的萤光，是永远永远也不会消失的。 1987.2.28—3.2